

我和《文艺报》的缘分

□南 帆

记 者:您在《文艺报》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在什么时候?当时是约稿还是自由投稿?

南 帆:我第一次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是1985年,文章题目叫《主观的文学批评》,是一篇约稿。

记 者:您跟《文艺报》交往最密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南 帆:上世纪80年代,我跟《文艺报》的接触还是挺多的,然后应该就进入新时代之后的近五六年。1985年,《文艺报》召开了一个会议,应该是青年评论家会议,参会的人有许子东、黄子平、吴亮等,我跟《文艺报》的联系大概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那个会上,差不多全国的青年批评家都来了,我也借此机会认识了很多同龄人。那时候贺绍俊也在会上,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我跟《文艺报》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

记 者:您当时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什么?

南 帆:我那时的研究重心基本上还是现当代文学,以文学批评为主,当然主要是现代文学,也讨

论一点纯理论的问题。

记 者:从《文艺报》的定位来看,您对《文艺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南 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的文学理论刊物少,就是那么一两家,很多批评者就围绕在《文艺报》周围谈论文学问题,《文艺报》也承担了很多研究文学现象的责任。在当时,不管是理论交锋也好,理论阐述也好,理论探讨也好,《文艺报》都是最重要的一个阵地。现在可能《文艺报》在这方面能力有所弱化,但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报纸发表的文章一般是两种,一种是富有理论色彩的,另一种就是能够真正引起当代文学集中讨论话题的。《文艺报》现在的覆盖面很广,文学和艺术都有。我觉得话题讨论还要再加强,因为报纸与刊物不同,现在报纸上你不能发2万字的长篇大论,但这在以前的《文艺报》是有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记得1985年,我在《文艺报》发表的《主观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曾强调,批评家个人对于世界要有个性化的认识。后来不久又登了一篇《读者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不能一切都是听

从读者的要求,读者到底有哪些?批评家当然要非常关注读者,但是也不能完全被读者带着走,就像作家的个性跟读者的希望之间肯定存在着差距一样,批评家的判断也跟读者的期待不同。另外,如果批评家只听从自己的内心,完全不顾作品的客观现实,产生这种现象怎么办?文章应该就是讨论这些问题,这两篇文章确实也反映出当时文学批评界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文艺报》刊登的作品比较少,到了2000年以后又写得比较多了。主要是80年代后期开始,我的文章就写得比较长,那时候约稿也比较多,基本上都被那些新兴起的刊物要走了,大体是这样。大概1986年以后,我又出了不少著作,里面的文章肯定是比较长的,写这种短小精悍的文章相对少。所以就今天的《文艺报》来说,我比较希望,一是文章可以长,但是要有理论的分量。另一个是说,文章的分量不能直接体现为把思辨或者抽象的理论全部浓缩到文章里,而是要敏锐地抓住当代文学上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我觉得这是对今天的《文艺报》来说很重要的任务,同时可能也是其他的学术刊物没有能力承担的。



《文艺报》与当代文坛

□程光炜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艺报〉编者按论》的论文,似乎说明,这家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最著名的报纸不单具有严肃性、政策性和导向性的文化特征,而且是文学艺术家心目中自家人的报纸。这可能是当代报纸的国家性格外的人间性格。而在一般研究中,人们注重的是它的严肃性和政策性的一面,却把它的日常性的一面给忽略了。

对十七年的《文艺报》,我没有切身直接的感性经验,上世纪70年代末上大学时,在图书馆地下一层的过刊资料室翻过一遍。2001年,为写一本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书,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过刊资料室翻了一下,写“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根据早年记忆和这次翻阅的印象敷衍成章。

1986年底,我来北京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全国第三届优秀新诗集评选”。当时评选组织工作,由《诗刊》编辑部组织,由评论家、该刊编委朱先树先生具体负责。朱老师邀请我和陈超、蒋维扬3个年轻人,作为评委会初选组成员与会,在此前,我与他没见过面,只是给他投过稿。评委会名誉主任为著名诗人艾青和臧克家,主任委员是著名诗人李瑛。评奖地点在北京朝阳区八里堡的鲁迅文学院。

某日,北京的天空下起了薄雪,气温很低。下午,《文艺报》年轻记者老木和高洪波突然踏雪来访,我不记得他们是找陈超、维扬还是那位,总之,我们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在房间里谈天论地,就算认识了。老木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来到报社,高洪波由部队转业到此。老木因此前编有《朦胧诗选集》,在诗坛小有名气,况且他留着那个年代少见的长发,穿的衣服不怎么利落,脸似乎也没有洗干净,一幅艺术家落拓不羁的形象。那时候,文学艺术圈的一些年轻人好像愿意把自己捯饬成这副模样,可能是觉得先锋罢。洪波是内蒙古人,形象高大。整整一个下午,我们从诗坛逸闻谈到朦胧诗的艺术风格,也有一点争执,但主要还是为了诗歌,没有个人意气。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总的来说风气是挺好的,没有利益利害之类的东西,即使有,也是比较隐蔽的,那是一种弥漫于整个文坛,对人们的思想和艺术观念影响很大的正能量的东西。

洪波和老木两位先生并没有把自己当做高高在上的《文艺报》记者,与我们几个外省青年不光聊得投机,彼此也很平等。很多年后,高洪波做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有次在会议上偶尔碰到他,还说起那次风雪之中在鲁迅文学院聚谈的情景。那时,我和陈超刚刚从诗坛上冒出来,朱先树先生是我们的恩人,但每次与他见面,从里到外也没有受惠人的意味。朱老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四川人,虽然来北京几十年,还是满口四川味儿的普通话。可能是第一次见面的缘故,他虽然随和,但不议私事,只谈公务。总而言之,通过3位中国作家协会的老师,我亲身感知到了《文艺报》的平民性格,或者像刚才说的,这份报纸的人间性格。

我给《文艺报》写文章比较晚,大概是十几年前才陆续投稿。以前只是阅读,通过这个文坛风向标来了解文学的潮流和动态,当然80年代那场比较大的争论和风波,确实也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眼球。跟报纸打交道日渐增多,可能是与最近两任的总编辑较熟有一点关系。但我给《文艺报》投寄文章,主要还是与具体的编辑有关,比如刘颖女士,还有行超等人。

给报纸写文章较晚,一是因为在我心目中,它崇高的文学地位,每次想到投稿,总有点忐忑的意思。另外一层原因,是我基本在文坛周围活动,跟文学现场批评有一点距离,虽然偶尔也会写一点评论文章。最后一个原因,是我对比较宏观带有总论性质的大文章一向心里没底。因为我是学现代文学出身,没有材料攥在手,积累到一定程度,很难下笔写东西。在一马平川的书桌上写这类文章,总感觉没有根据,理不出讨论线索,找不出文章主旨,因此最终也无法谈出自己的看法来。这主要是我个人的问题,与报纸无关。其实,对关心《文艺报》的作家来说,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他们不会无动于衷。如果涉及比较宏观的对当下文坛走向、趋势和潮流发表看法,相信不少人也会留意一二。我心里明白这个道理,但临到动笔写文章的时候,反而怯场了。

以上所写,是说《文艺报》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朋友,我将其看做是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之间的联系人。虽然报纸承担着国家某些重大的责任,是当代文学界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然而在平时,尤其是跟文学创作发生直接关联的时候,不光我本人,相信很多人也都会毫无隐瞒地在《文艺报》举办的会议上直抒胸臆,或者在文章里直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与报纸的亲密关系。

70年的《文艺报》已载入史册,它已成为研究界竞相研究的对象。早有相关的博士论文问世,硕士和本科论文,更是不计其数。随着时间的拉长,它本身的价值也在增长,人们不光会通读全部杂志报纸,仔细寻找当年的历史踪迹,而且会寻找它周边的相关人物和档案,以做这份报纸的史料补充。这座不断被开采的当代文学史的丰富矿藏,不仅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博物馆,而且也具有了与今天对话的功能。我们关注和研究它,一方面是我们有与它所携带的历史对话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也触摸到了它与今天对话的心灵律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了解《文艺报》历史的人都知道,丁玲、冯雪峰、张光年先后担任过《文艺报》主编。在文学界政治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出于职责,或亲自组织,或亲自撰文,批判过一些作家和作品,可能也伤过有些作家的感情。比如冯雪峰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对萧也牧后来命运的影响还是有的。张光年的《向日葵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对他十七年主持该报纸的工作谈得不

多,较多内容是记叙自己在湖北咸宁的向阳湖五七干校蒙难的时候,作协的群众以及一些年轻干部,并没有对他落井下石,在他因为年纪大,干活或走路时总在泥泞的路上滑倒,或是生病期间,还曾得到群众的关心帮助,使他感到了人间的温暖。

写这篇文章,我没查过相关文献,不知道冯雪峰落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是否会对当年伤害萧也牧,在内心深处产生一丝的负疚感。我约略看过一点材料,知道每逢政治运动过去后,生活恢复正常,人们的关系又调回到过去的轨道上的时候,在《文艺报》上写文章批评人的作者,也会和被批评者坐在一起,或是聊天,或是聚在一起吃饭,似乎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不曾发生。

历史就是这样。当时发生的时候,一副剑拔弩张的气势,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氛围。然而,当这些都成过眼烟云,尤其在岁月已远,很多故事被摆到研究者的文案上,也不过是一些没有生命的史料文献。大家反正都不认识,想怎么研究,怎么得出结论,都没有心理负担。然而,当我们仔细触摸当年的那些材料,比如《王蒙自传》,却不觉得它们是没有生命的,它们似乎还在呼吸,就在我们身边呼吸,情绪的波动、思想的激烈斗争、整夜无眠的痛苦、人际关系的反反复复,等等,仿佛在一夕之间就都复活了。就像我们自己曾亲身经历过那些事一般。

说研究者在埋头工作的时候,既不是冷血地对待历史材料,对待当事人的忧虑和苦闷,带着一副与己无关、高高挂起的姿态,有时候也会被动触,无非是要表明,这家著名报纸的人间性格。某种意义上,它除了高大上的严肃性、政策性,在当代史中还是活生生的生命存在。我研究那些材料,与我当年在薄雪之中的鲁迅文学院,和老木、洪波先生等聊天,感觉是在一个历史层面的。宏大与具体、国家与个人、政策与生命,并不都是相互分离,井水不犯河水的,它们是一种彼此相融、互设界限、又经常不遵守界限的那种复杂的历史关系。

因此在我看来,任何报纸媒体,都有公家事和个人私谊这两个层面。只是研究公家事的学术成果,虽然在文学制度方面有独特贡献,然而是不完整的,也可能是片面的。但公开媒体也不是靠个人私谊能够支撑起来的,它心中装着天下,装着国家民族,有担当,有责任。更多的时候,它主要还是为后者服务的。否则,《文艺报》的巨大社会能量和历史价值也无从谈起。虽然张光年70年代在咸宁五七干校,他与一帮文人经历了一段艰苦屈辱的锻炼生活,然而,他从1976年起参与《人民文学》和《诗刊》的工作,每天操心费神,还经常如履薄冰,这些文字,仍然依稀能够看到,他身上的公家事意识是非常自觉和强烈的。他没有因为戴罪之身,没有因为那些帽子并未全部摘掉,就把国家大事置之身外。从中,让我们这些圈外人看到了文艺报社的同仁身上某些难得的品质。

从1949年7月至今,与新中国同时成立、同步行进的中国作家协会,已走过了整整70年的非凡历程。中国作家协会的70年,涵盖了1949年到1979年的前30年和1979年到2019年的后40年。在这后40年,我有幸介入其中,成为它的一员,并在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和组织的带领与帮助下成长成熟。回首往事,浮想联翩,这里就影响深刻的几件事简作忆述,以此感念中国作协 and《文艺报》对我的成长成熟的种种提携与帮助。

复苏的文坛盛会让我意外受益

1979年7月,我从陕西师范大学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到单位不久,就接到了《周恩来与文艺》的编辑任务。这部书稿的主编是陈荒煤,他当时以文学所副所长的身份主持文学所的日常工作。其间,与他时有接触,他看问题的高屋建筑,处理问题的运筹帷幄,都使我深受教益。也是因为编辑这部书稿,有事要找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党委书记苏一平。他当时作为“四次文代会”筹备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在东单北边的一个宾馆正忙着筹备文代会事宜。找他谈完事,我小心询问,像我这样的什么都不是的小青年,有没有可能参加“四次文代会”?他考虑了一下说,正式代表已经确定,你还不够资格,但你也属于文学范围的人,可以列席记者的身份听开会。他帮我办理了一个列席证,于是,我便意外荣幸地旁听了“四次文代会”。

四次文代会从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共开了18天。我主要旁听了几场大会。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10月30日下午的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邓小平同志摆手让大家坐下。他代表党中央致《祝词》时,念完一段,就掌声一阵,致词结束更是掌声经久不息。有的代表挥舞着手上的《祝词》激动地说:“每一句话都很重要,每一个字都讲到了我们的心里。”

11月3日之后,举行中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还有一些大会发言。给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周扬同志在讲话中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历次运动、斗争后,站起来郑重地向丁玲、陈企霞等人道歉。此时,台下的萧军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声说:“周扬同志,好!敢于自己承认错误是勇敢的人!”场上随即爆出震耳的掌声。还有一次,是王蒙、白桦、蒋子龙、刘心武、张扬等人的大会发言。每个人都作了精心准备,发言都慷慨激昂,都有语惊四座的金句。听着一个个作家的演讲,你不能不受到感染,得到鼓舞,并对历次运动造成文坛的恩怨感同身受,尤其是对文学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如此勾连紧密有了特别深刻的体味。

各代表团的分会场,据说也很精彩。我不能一一参加,便到西苑饭店的简报组,去找从文学所抽去办简报的张初要了一套简报,由此了解了其他会场发言与讨论的更多情况。

赶上这次“劫后”复苏的文坛盛会,对我震撼很大,收获也甚多。畅所欲言的会议,坦诚相见的文学家,以及他们言谈举止中所溢发出对文学事业的由衷热爱,对文学自由的无畏呼喊,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这使我对文学有了全新的认识,深深领悟到文学的神圣,并为能够追随着他们而倍感荣耀。

加入“作协”使我有了解“第二单位”

1980年之后,文坛在不断复苏中日显活跃。那个时期,各种研讨会很多,文学论争也很频繁。我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同时,也把一些精力用于参加一些研讨会。记得先后参加的重要会议,有于1980年初召开的“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聆听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的重要讲话,有于7月底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研讨会”,有于8月20号在北京师范学院召开的“王蒙创作研讨会”等。那时参加研讨会还轮不上我发言,就利用笔头快的优长一个劲做记录,完了就根据速记写一篇会议综述或讨论纪要。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试着就能拿得准的作家作品撰写评论,先写陕西的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后又写过铁凝、莫言、张贤亮。这种文学活动参加得越多越深,越对中国作协心生敬意,就萌发了想加入中国作协的想法。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文学研究所都在日坛路6号的一个院子里。因此,我与文学所当代室的朱赛、张炯、蒋守谦、朱兵等人,与《文学评论》的陈骏涛、杨世伟、蔡葵、丁振海等人,经常碰面,常有接触。知道他们大都是中国作协会员后,我想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愿望就更加迫切了。我向他们咨询像我这样的人可否申请入会,他们鼓励我说,现在的作协比较注意发现和培养新人,可以试试看。于是,我托人从作协创作部要来一份入会申请表,填好表,需要两位老会员推荐。我想自己年纪既轻,水平又低,一定要找两个有分量的人推荐。于是我想到了陈荒煤,他那时已经离开文学所,到文化部任副部长了,但偶尔也会来所。我趁着他一次来所的机会,斗胆呈上申请表请他签署名字,他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好像还写了肯定或鼓励的话。正好副所长许觉民有事找我,我又让许觉民作为第二位推荐人签了名字和意见。就这样,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申请表送往了作协创作部。

大约是1984年年底,我收到中国作协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里边是批准入会的通知,还有一份黑皮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我十分意外,格外惊喜。从此,这个作协的“会员证”与社科院的“工作证”就总挂在我身上。心想自己除去在社科院的单位,现在又有了“第二个单位”,它让我心有依托,身有依归。

我觉得按照我当时的情况,批准入会应该是一种宽容与宽待。这种宽容与宽待里包含了对我的扶持培育和信任。此后中国作协的一切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从不懈怠。现在各种活动繁多,而且多有重叠,参加哪个不参加哪个,都要不断抉择。但我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中国作协的事总是排在第一位,尽量不缺席。

前些年,我退休后仍在一位副院长主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工程做点事。他几次有事找我,我都在作协参加活动。有次见面,他以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你有些不对,拿着我们社科院的钱,总去给中国作协干事。”我回他说:“社科院的钱是国家的钱,中国作协的事是国家的事,都是一回事,你不要太本位。”这虽是玩笑话,但仔细想想也是,中国作协已是事实上的“第二单位”了。

《文艺报》助我不断成长

创办于1949年9月的《文艺报》,在中国文学70年的发展历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贡献。就1978年7月复刊以来的40多年看,它在忠实记录文学发展的行程,强力主导文学事业的发展上,也是功绩伟伟,无可替代。

复刊后的《文艺报》,在沙滩北街的《红旗》杂志社(《求是》前身)院子里的木板房里临时办公。虽然环境简陋,却拥有着堪称豪华的编辑阵容。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报》都是双主编、双副主编,这在其他刊物里极其少见。编辑部和理论组里人才济济,大家云集。如谢尔旺、阎纲、陈丹晨、刘锡诚、雷达、高洪波、李炳银等。那时的《文艺报》是16开的杂志,里边有文学界的各种信息与资讯,又有新人新作的评论,理论问题的探讨等。可以说,在那个时候,要了解文坛,把握文情,《文艺报》是必读之刊,不可或缺。因此,我当时虽然囊中羞涩,但还是自订了一份《文艺报》,而且每期都从头看到尾,一个字也不放过。

1981年6月间,我对当时文艺批评中出现的一些“扣帽子”、“打棍子”的遗风很有看法,便忍不住写了一篇《对于文艺批评中一些现象的看法》的文章,投给了《文艺报》编辑部。大约在《文艺报》1981年15期上(时为半月刊),这篇小文章被发了出来,但料想不到的,很快就被卷入了随后而来的批评《苦恋》的事件。事后知道,这篇文章给《文艺报》和中国作协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编辑部主任陈丹晨、主编卢罗荪、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都分别就此作了检查。由这件事,我既领略到了文学与文坛的复杂莫测,又与《文艺报》有了一种祸福相依、休戚与共的亲近感。

《文艺报》对我最大的帮助,是那些身为理论编辑的评论家的不吝指点与多方提携。这里边我接触较多,对我影响较大的,一是阎纲,二是雷达。阎纲的叔叔阎景翰是我在陕西师大中文系上学时教写作的老师,对我帮助甚大。到北京后,阎纲好像接替了他叔叔的工作,继续教我写作。他写文章,文字里充满激情,又有超凡脱俗的表述,真情与诗意的相互杂糅,构成了他独特的批评风格。他的文章我都会认真研读,仔细品味,从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营养。雷达比阎纲年轻,比我年长,经由频繁的交往,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朋友。雷达的评论常由敏锐的感觉生发开来,并上升到理性的层面,由此提出引人关注的话题与问题。如“主体意识强化”、“民族灵魂重铸”、“灵性激活历史”等等。从他的评论中,我看到了理论素养的重要性,也看到一个评论家不断成长的可能性。我的资质使我成不了阎纲、雷达,但我对他们卓有特色的评论,既从旁静观默察,也尽心心摹手追。

在别人看来,《文艺报》就是一份报纸而已,但在我看来,它确实是一个“摇篮”,一个孕育、培育了无数作家和评论家的“超级摇篮”。

我的「第二工作单位」

□白 烨